

从互动到联动:20世纪中后期 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变迁研究^①

张 妍¹,张彦通²

(1.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136;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191)

摘 要: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间的关系是教育科学落实到实践层面的重要方面,20世纪中后期,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教育科学的改革与发展开始越来越需要公共政策引领与驱动,教育科学开始逐步意识到,在理解和改变世界的问题上,必须和公共政策架起持续互动的桥梁;另一方面,公共政策也开始体现出更需要教育科学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责任。二者之间呈现出了从简单互动走向逐步联动的新局面,既体现了公共政策与教育科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教育科学从公共政策边缘走向中心的显著变化。

关键词:教育科学;公共政策;高等教育;教育政策;智库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20)06-0041-07

DOI:10.16697/j.1674-5485.2020.06.007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不断强调国民经济对科研服务的实际需要,科学研究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公共政策不再仅依附政府,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非官方组织影响,诸如科研院所、私人组织、高校等非政府组织,他们不同程度地拥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话语权,使得多方利益相关者在政策过程中开始发挥影响力,公共决策的主体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决策的民主性得到了提升。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2019年11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第一次集中概括了教育科学为推进国家治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的总体要求,并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可以看出,作为公益的教育科学逐渐成为影响国家决策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科学的情况下,教育科学开始作为国家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资源配置的途径,成为公共政策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在此

收稿日期:2020-01-22

①基金项目: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资助项目“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东北高等教育战略高地建设研究”(XLYC1804004)。

作者简介:张妍,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张彦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背景下,本文期望从20世纪中后期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变迁研究中,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掌握我国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期为我国后续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联动发展提供思路与启示。

一、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内涵及其关系

按照《辞海》的解释,“科学”是对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可检验的解释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了的的知识,因此,科学的对象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结果是形式化的理论内容。从科学的对象出发,科学通常分为研究大自然事物和现象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等)、研究个人和社会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以及将现有知识用于工程和医学等实践的应用科学。科学主要基于研究,其目的是通过研究来影响国家政策,因而,科学通常在研究机构及政府机构中进行。根据“科学”的含义,教育科学可以描述为研究教育现象、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教育规律和教育实践的各门学科总称。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和开放的领域,一方面,它是独立的科学体系,涉及到教育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另一方面,它也经常孕育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中,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整合和吸收其他科学的方法论为己所用。“教育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交集的关系,它的特殊性不能由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其他科学范式来塑造和替代,它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内在逻辑结构、学科边界和学科立场,因此它是另一个体系。”^[1]随着20世纪全球公共环境的迅速发展及对其教育的不断影响与介入,世界各国对教育科学的需求和要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教育科学开始作为影响与参与公共领域发展、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为公共政策提供科学指导和决策引领。从这个角度上说,教育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同样具有服务社会决策与指导公共实践的重要功能与使命。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智库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成立各种教育研究院,以确保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同样,美国很多社会政策的实施也都要依赖教育科研与实践培训,如劳动部门的就业政策就必须建立在教育科学与调查研究基础上。

“公共政策”主要是指国家通过资源的战略性运用来协调社会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系列政策总称。从政策的主体上说,公共政策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对象是社会事物,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资源、达成公共目标,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纵观公共政策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任何公共政策都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制定的,因此,公共政策具有基于实践并必须与实践融合的显著特点。正因如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往往是复杂的,但不论何种公共政策,其过程都是基于:发现并提出问题、由问题提升为国家议程、综合问题涉及的各利益关系、保持与各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将政策合理化和法治化、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的反馈修正政策的逻辑,整个逻辑主要围绕社会问题的提出——各相关者的利益输入——政策的输出三个基本环节,公共政策始终按照公众的利益表达与政府的资源分配这样的一条主线进行。“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往往具有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属性,承载了多项任务,因此,其成功取决于横向上的高位推动和纵向上的社会协调与配合。”^[2]因为这其中要牵涉到各种利益组织、机构、受益人或团体,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各种外部力量都试图影响公共决策,所以通常情况下的公共政策就是社会各方力量间的协商与制衡的过程,是社会博弈和选择过程。因此,公共政策不仅是政府活动的产物,更是国家与社会联系的纽带。

实际上,从古至今,对一切科学领域具有公共职能和责任的公共政策来说,其与教育科学一直都具有内在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是建立在教育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内在影响与规定上。因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除了需要掌握社会现象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问题,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中的“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归根还是教育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校教育,对此,俄国教育科学的创始人乌申斯基曾说过“‘人’是教育的对象”^[3]。从这个角度上说,公共政策需要教育科研作为其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指导,虽然社会科学也会体现这个作用,但与更接近大众知识体系的教育科学相比,它还不能恰当地解读“人”的发展规律,所以也很难精准地解决“人”的问题。尤其在20世纪中后期二者之间从

互动到联动关系的体现,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二、20世纪中后期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变迁过程

(一)互动:20世纪60年代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选择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公共政策干预,鼓励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教育科学在内的科教领域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与评估之中。从当时全球教育科学的现状上看,“基于人文与哲学的非实证研究占据主体,学术共同体对证据重要性的认识还远不及其他科学”^[4]。因此,这时的教育科学主要以探求真知为目的、以学术话语为表达方式。但因当时的公共政策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旨归,从而导致了教育科学的理论成果与公共政策的实证需求存在很大距离,也正因如此,对教育科学仅限于“理论研究”或混合于“社会科学”的定位在这段时间越发凸显。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一方面,各国的公共领域忽略了教育科学的各种规律,认为它们过于抽象不能解决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各国的公共领域又认为即便是实证研究,也只是把日常经验和亲身体会简单地上升为教育科学。与此同时,教育科学研究者也总是在质疑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理论依据,不能被公众接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20世纪60年代公共领域的需求促使教育科学仅以单向的线性模式服务于公共政策。一方面,大量的教育科研成果仍然被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视为基础理论研究,认为教育科学就是课程、教学和学习等研究的“三位一体”,并不能促进公共实践;另一方面,因为多数教育科学研究通常是基于历史与发展规律的后向式实践逻辑,而公共政策则是以解决现实及未来问题的前瞻式实践逻辑。因此,教育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实施具有很大的时滞性,导致了20世纪中期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仅以“简单的互动”呈现。教育科学的整体属性在当时的公共政策领域看来,“教育科学”只是“教育”而不是“科学”。

从纯粹的学理层面剖析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科学的整体属性,从理论上说,教育科学的规范性在许多概念使用中常与社会科学的严谨性有所

不同,只是这种不同并不是人为所致,正如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所言,“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学科(如教育和社会工作),学科方式的整合大多不牢固和不清晰,这种取向主要是由于学科的知识不确定性所致”^[5],所以教育科学理论研究中的许多概念在普及和推广上有一定局限,但这无疑也成为制约教育科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主要因素。从实践层面上说,公共政策也希望教育科学基于一定的实证研究但也不能忽视理论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为“教育学圣地”的芝加哥大学教育系倒闭极具代表性,20世纪初,时任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的贾德试图将教育学变成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领域,所以极力推行教育科学的实证研究而忽视理论研究,这种做法导致的直接结果是,1997年教育系因未能产生广泛的实践影响和经济利益而倒闭。显然,当时的教育科学即便专注实证研究,并没有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形成一定的效益。进一步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教育科学的任务是不仅要要在社会发展中取得令人瞩目的作用与成就,更要在理论的科研创新与社会发展之间作出相应的平衡。由此,“在包括教育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描述客观事实抑或是解释社会规律,实证都有其明显的局限性”^[6]。科学需要实证,但实证并不必然导致科学。

(二)联动:20世纪中后期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变迁

20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巨大挑战,社会需要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识别主要问题并采取一致行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4年发起“社会转型管理项目”为标志,这项研究集中探讨科学与政策间的关系,并就科研成果如何促进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展开探讨。在此背景影响下,更为复杂的教育及人的社会性问题,如人口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等为教育与公共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制定开始考虑重构新型关系,教育科学需要重新确定它们的主题,政策制定者需要反思制定原则。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是简单互动,那么,到了20世纪70年代,二者关系已经转向逐步联动。这里所说的“联动”,是教育科学在公共领域中作为“主体元素”并发挥

能动作用的“联动”。虽然这种联动主要是社会诉求的结果,但也体现为:一方面,受媒体和与公众的直接传播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传播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从单向传播转变为双向传播、由控制和宣传转向协商和互动模式。再加上技术进步和社会转型等各方面因素交织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间接提升了公共政策对多元相关者利益的考虑。尤其互联网的兴起与传媒的市场化不同程度地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在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产生,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在促使公共政策向更为公开的方向转变,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启的社会转型计划(MOST)项目,这个项目试图从国家政策出发,对每种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探讨和认定。也正因此,教育科学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影响力在日益提高,尤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与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中所反映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和尖锐,为公共领域对教育科学的需求创造了条件。在各种公共问题充分暴露后,教育科学的社会效应得到了广大公共领域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与重视。这一点在社会科学的各种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文献中有关教育领域的术语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促使教育科学意识到自身无论是作为纯粹的基础研究,还是作为服务于社会及公共领域需求的应用研究,都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服务职能,在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开始重新梳理研究维度与观察视角。由此,教育科学的文献研究中也出现了大量公共领域的术语,开启了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在新时期的联动发展态势,这种联动通过相互的“内化”和“外化”凸显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教育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内化”。所谓“内化”,即把外部影响内化到自身实践的过程。教育科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完全封闭的,它是与其他科学及经济、文化等系统密切相关的,一方面要满足教育目标,另一方面也要与社会紧密联系,促进社会发展,这既是教育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使然。尽管教育科学一直具有相对自主的组织体系,在其运作中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同时具备丰富的理论自觉性和内在逻辑性,但这些都需公共体制的引领与驱动

才能运作与发展。曾经的芝加哥大学教育系被移至哥伦比亚大学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促进社会实践方面的巨大责任和义务,也体现了公共政策对教育科学的实践作用始终具有鲜明的内在规定性。20世纪70年代初,伴随着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的大众化进程,它已不仅是为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而独立于公共领域外的知识系统,更是一种关乎社会实践与发展的社会建制,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分化的强烈影响下,人力资本成为主要资源,教育科学在公共政策中的利益表达和议程设定方面发挥的功能越来越大,教育科学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机构大力引入教育科研支持自身发展。

第二,公共政策对教育科学的“外化”。所谓“外化”,即把外部影响付诸内部实践的过程。对于公共政策来说,教育科学需要经过公共领域问题是否解决与民众需求是否满足的考验和反复论证,从这个角度上说,公共政策对教育科学的“外化”过程带有主动检验的性质。早期“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除分散在各级政府外,更多的公共和私人部门也加入到政策进程中,以基金会、智库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始终是影响美国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角色”^[7]。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欧美学者已经对教育科学取向进行了分析,认为教育科学在这一时期对公共治理的影响已经扩散到难以估量的程度,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越来越强调教育科研对公共发展的重要作用,公共政策大大提高了对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使用和经费帮助。伴随着教育科学在公共治理中的地位提升,直接服务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地位逐渐突显。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驱动教育以公共和公益的身份传播的条件下,“教育”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公共价值论的角度来讨论教育问题的迹象越来越突出,教育的公益性变化为教育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参与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日益自由的公开讨论极大促进了教育思想与理论的传播,使公众更易于接触和理解教育信息与资讯,从而推动了人们对教育现实的关注,教育传播不断扩大和延伸为公共决策提供了更多数据论证和支持。事实上,早在教育科学建制化之前,一些国家就已对教育信息进行统计整理进而服务于公

共政策,如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国家就已经开始进行初级的教育统计以作公共政策的管理和执行之用,此后随着现代化发展,教育科学对管理决策的影响开始明显,这时期的许多重大教育改革都体现了教育科学在公共领域的广泛应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也越来越主动要求教育科研发挥优势并提供建议,我国近几年具(半)官方背景的地方教育科研院所已经开始介入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科学从来没有放弃对基础性研究的重视,但因公共政策的“外化”影响,教育科学也越来越关注成果转化并以其特有方式共同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教育科学参与的公共政策格局也逐步走向了常态化,半官方背景的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也通过持续积累大量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基于社会问题、直达社会要点并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机制。教育科学的智库功能不断显现,教育科学从公共政策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成为与公共政策保持紧密衔接的重要机构之一。当然,这与20世纪中后期公共政策“通过收集分散的信息克服信息不对称,通过集体决策来达成共识,通过广泛协商来克服个体决策的片面性与主观性”^[8]的集思广益模式逐渐成为决策的主要方式有关,既体现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也体现其逐步需要教育科学提供资政建议的利益需求。

纵观20世纪中后期我国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转变,从宏观层面看,二者已经开始从互动走向联动,虽然至今为止还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国家教育规划之间仍然缺乏充分的逻辑联系,但公共政策体系已经开始包含相关的知识、技术等创新体系,开始涉及到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整体上二者的关系开始处于逐步联动状态。从微观层面上看,在国家战略发展规划中也开始存在与教育科学相关的部分。如2019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印发的首个教育科研文件,对做好新时代教育科学工作具有重大开创性意义,为新时代教育科学发展及其与公共政策的联动关系提供了强大支持与制度保障,深刻体现了教育科学在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三、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变迁遵循着较强的内在规律与逻辑

20世纪中后期的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经历了较明显的变化,整个变化过程遵循着:问题提出—利益输入—政策输出这一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时代特征,即不同时期教育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对公共政策的需求,也体现出不同阶段教育科学中备受关注的公共话题。尽管这些阶段的教育科学发展历程较为曲折,但总体来看,教育科学因其以科研不断引领和推动全社会发展、持续探索并逐步解决更加符合公共领域发展实际的新问题,由此带来了教育科学的不断丰富和完善。而这也同样深刻反映了真正的教育科学与社会科学、应用科学一样,都是观照于社会现象与公共问题的科学。因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归宿都关乎“人”的问题,而关于“人”的研究,首先体现在教育科学上,因为“人”的出生、成长与成才始终都离不开教育,无论是哪一种教育或哪一阶段的教育。一直以来,人们把教育只当成“学校教育”和“教师教育”,致使教育科学在公共领域方面的基础和关键性作用始终被质疑。对于这个问题,康德早在《教育论》中就把教育科学作为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来讨论。汉斯·波塞尔也明确指出,“在科学中,只要对问题的回答方式是论证性的,是按照一定的系统的方法取得的,那么对原因的提问、对现象的解释以及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就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与损害”^[9]。与此同时,杜威的实践教育也开始探讨教育科学作为社会建构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由此,在教育科学与公共关系的问题上,不论是康德、波塞尔还是杜威,他们都认为教育科学不仅是“教育”更是关乎社会和“人”的“科学”,完全不亚于严格的社会科学,“教育科学同样是一门严肃的科学”^[10]。

(二)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联动关系在社会文化中产生重要影响

对公共领域来说,教育科学已经开始表现出广泛的渗透力,以往对教育科学的误读影响了其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也同样证实了“科学可视为发生由两种不同环境所构成的背景下的智力过程:

其一是经验观察的世界,另一个是非经验的形而上世界”^[11],教育科学的过程同样是由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双向过程,而不是仅从经验出发或单纯以理论为起点的单向过程,在教育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在重视经验与事实研究的同时,始终没有忽视处在科学连续体另一端的理论与思想研究。虽然今天的教育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甚至低于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但总体上,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联动已成为世界教育科学完善与发展的共同理念。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联动会在当前逐渐完善的社会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如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在短短二十几年高速崛起成为世界大学智库中的佼佼者,主要得益于它始终坚持以公共政策需求为导向,从而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众多重要的有效策略。^[12]

(三)有利于教育科学更好地发挥中介作用,让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与落实得到持续效应

当前,理论科研、政策制定和应用实践交叉与耦合的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生产兼顾理论发展和应用导向,学术与科学不仅要有逻辑的理论研究,还要越来越重视对社会、生活、生产及实践的作用与影响。这其中,不论理论还是实践,都逃不过服务社会的公益性、应用性与实践性。目前的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越发凸显,教育科学不仅是各国决策者在处理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时所倚重的重要力量,还是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继续探讨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间的关系问题,对促进教育科学更好地发挥公共领域中专家体系与大众体系之间的中介作用,让公共政策的执行得到持续效应,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目前,“中国的教育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教育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教育的利益格局处于深度调整、利益矛盾突出和利益关系重新组合的发展状态,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13]的情况下,在教育科学已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重要决定性因素的今天,深入到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关系的过程是全面理解教育科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及理性看待二者关系的有效途径。因为未来的“教育发展不能只靠政府;管理庞大的教育体系,不能只靠教育行政部门;解决庞杂的教育问题,不能只靠学校”^[14]。基于此,本文的研究仅仅

是开始,未来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这是公共政策制定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教育科学不断深化自身的公共性、公益性及应用性,从而有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重建教育科学研究的公共政策维度,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价值

如今,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使得人类社会生活从国家扩大到全世界更大范围,影响教育科学和公共政策发展的因素更加多元,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间的关系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今天的公共政策不再仅依附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渠道不再仅限于政府,“教育科学公益化”“公共政策民主化”等新趋势超出了原有的研究维度,也重新界定了两者各自涵盖的范围。在此背景下,我国如何重建教育科学的公共政策维度,如何顺应新时代重新定义教育科研的外延和内涵,构建新的研究范式,成为教育科研亟待解决的新问题。研究认为,只有从现实的角度重建教育科学的公共政策维度,方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如在交流机制上,开辟教育科研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结合之道,为新型对话提供创新空间;在传播机制上,畅通并拓宽教育科研成果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的渠道;在研究型人才培养机制上,以丰富的现实经验为前提,多为教育科研学者创造了解公共管理实践的机会,让教育科研学者切身感受一项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复杂程度,促使教育科研更加符合现实需要。

伴随社会公共问题的不断增多,未来的教育科学与公共政策间的关系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唯有从现实的角度重建教育科学研究的公共政策维度,才能取得具有符合时代发展与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只有驾起教育科研学者与公共政策制定者之间持续互动的桥梁,才能促进教育科学发挥好专家知识体系与大众知识体系间的中介作用,真正实现二者的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 [1]李政涛.教育学的边界与教育科学的未来——走向独特且独立的“教育科学”[J].教育研究,2018(4):4-14.
- [2]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1(5):61-79.

- [3][俄]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M].张佩珍,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 [4]柯政.教育科学知识的积累进步——兼谈美国教育实证研究战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31-46.
- [5][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90-91.
- [6]项贤明.论教育科学中的实证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17(8):17-24.
- [7]GALEY S.Education Politics and Policy: Emerging Institutions, Interests, and Ideas [J].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2015(1):12-39.
- [8]鄢一龙,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模式演变:以五年计划编制为例[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14-122.
- [9][美]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M].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45.
- [10]薛晓阳.从历史博弈到学理分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关联[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1):47-55.
- [11][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M].赵立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
- [12]田山俊,陆军.一流大学智库高速崛起的内在成因——以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为例[J].现代教育管理,2019(8):8-16.
- [13]刘国瑞,王少媛.推进省级教育研究机构向教育智库转型的若干思考[J].现代教育管理,2014(4):1-7.
- [14]张彦通.积极推进教育开放,全社会参与办大教育[J].教育研究,2009(12):3-5.

(责任编辑:杨 玉;责任校对:张德诚)

From Interaction to Linkage: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

ZHANG Yan¹, ZHANG Yantong²

(1.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36; 2.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into practic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 new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On the one hand,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increasingly need the support and push of public policy. Education science gradually realizes that it must build a bridge with public policy to understand and change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public policy has begun to reflect the greater need for education science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The two have presented a new situation from simple interaction to gradual linkage,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policy and education science, but also reflects the significant change of education science from the edge to the center of public policy at a deeper level.

Key words: education science; public policy;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policy; thinktank